

清华大学藏竹书《系年》的文献学考察

陈 伟

〔摘 要〕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系年》,大约写成于楚肃王、宣王之世,其中肃王之世可能性较大。从详记楚国君臣谥号、称楚王去世为“即世”等情形看,作者应是楚人。其体裁与《春秋》、《竹书纪年》等编年体史书不同,似从《左传》一类文献改编而成,疑与《铎氏微》相关。

〔关键词〕 系年; 编年体; 铎氏微

〔中图分类号〕 K8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13) 01—0043—06

〔作者简介〕 陈伟,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教授 430072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系年》,使用 138 支竹简书写,分 23 章。^① 作为一部先秦时期的长篇史著,在文本解读、史实考订之外,它的文献学属性和特征,也是令人关注的话题。我们尝试在学者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系年》的写作年代、作者国别及其体裁等问题。

写作年代

《系年》整理者指出:与《竹书纪年》不同,《系年》的记事始于周初。其一至四章述及西周事迹,说明周王室如何衰落,晋、郑、楚、秦、卫等诸侯国怎样代兴。第五章以下叙述春秋到战国前期史事,更为详细。有些地方结合作者当时形势,如第二十章“至今晋越以为好”,应在楚威王灭越即公元前 333 年以前。所见诸侯名号,最晚的有二十三章的“悼哲王”即楚悼王,可知此篇作于楚肃王或更晚的楚宣王之世,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所收的《楚居》时代大致相同。^② 其说可从。这里补充作一些分析。

《系年》在末章(23 章)所记武阳之役,为全书最后一件史事。相关记载如下(释文采用通行字写出):

楚圣(声)桓王立四年,宋公田、郑伯骀皆朝于楚。王率宋公以城赅关,是武阳。秦人败晋师于洛阴,以为楚援。

圣(声)王即位,悼哲王即位。郑人侵赅关,阳城桓定君率赅关之师与上国之师以交之,与之战于珪陵,楚师亡功。……

明岁,晋人率余率晋师与郑师以入王子定。鲁阳公率师以交晋人,晋人还,不果入王子。

明岁,郎庄平君率师侵郑,郑皇子、子马、子池、子封子率师以交楚人,楚人涉,将与之战,郑师逃入于蔑。……

明岁,楚人归郑之四将军与其万民于郑。晋人回(圉)津、长陵,克之。王命平夜武君率师侵晋,逾郛,止滕公涉洧以归,以复长陵之师。

①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貳)》,中西书局 2011 年版。

②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貳)》,第 135 页。

戾年 韩取、魏击率师回(围)武阳,以复郢之师。鲁阳公率师救武阳,与晋师战于武阳之城下,楚师大败,鲁阳公、平夜悼武君、阳城桓定君、三执珪之君与右尹昭之族死焉,楚人尽弃其旗幕车兵,犬逸而还。……

整理者认为“悼哲王即位”当悼王元年,第一个“明岁”在悼王二年,第三个“明岁”在悼王“四年”。^①关于“戾年”,整理者注释说:亦见清华简《子仪》。“戾”、“荐”音近可通。《尔雅·释言》:“荐,再也。”荐年即再一年。^②今按,“戾”似当读为“洊”。《文选·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之四》:“下贫无兼辰之业,中产阙洊岁之货。”张铣注“洊岁,谓再岁也。”以此计数,武阳之役在楚悼王五年(公元前397年)。由于竹书已使用悼王谥号(“悼哲王”),只能写定于悼王之后。考虑到武阳之役离悼王去世(公元前381年)尚有16年,而肃王在位又有11年(公元前380~公元前370年),《系年》写于肃王在位期间的可能性比较大。

还可注意的是,《系年》最后两章即22、23章楚国以外的国君,多无谥称。22章中无谥称者有“晋公止”(幽公)、“韩虔”(景侯)、“赵籍”(烈侯)、“魏击”(武侯)、“越公翳”、“齐侯贷”(康公)、“鲁侯侃”(穆公)、“鲁侯彝”(穆公)、“宋公田”(休公)、“卫侯虔”(慎公)、“郑伯骀”(繻公)。^③23章无谥称者有“宋公田”、“郑伯骀”、“韩取”(烈侯)。除越君外,其他国君在传世文献中都载有谥号。这可能是因为《系年》写作时间与这些国君去世定谥的时间相近,作者尚未知悉而缺载。如然,《系年》写作于肃王之世的可能性也比宣王之世要大。

作者国别

关于《系年》的作者,李学勤先生针对有关周平王之立的记载指出:仔细考查,《纪年》、《系年》这一史事的叙述仍有所不同。《纪年》说平王之立在前,拥立他的在申侯外还有鲁侯和许文公,而立王子余臣的只是虢公翰,可见在“二王并立”之中,余臣没有法理上的优势,他又因不是周王嫡传,所以只能称“携王”,没有谥号。《系年》的说法则并非如此。……吟味《纪年》、《系年》这方面的差别,我感觉是反映出两书作者立场的差异。《纪年》是三晋之一魏国人所撰,于东迁以下用晋纪年,实即始于晋文侯。他将“晋文侯定天子”,拥立平王,杀死携王一事讲得更更有理据,是可以想象的。《系年》的作者估计是楚国人,没有必要为晋文侯说什么好话,落笔自然有区别了。^④不过,如果《系年》与《纪年》对周平王相关记叙有异出于作者立场的话,应该只说明《系年》作者非晋人,而不必定是楚人。要说明作者为楚人,需要另寻证据。以下尝试举出三点:

其一,上文说到22、23章楚国以外的国君多无谥称,可能是因为《系年》写作时间与这些国君去世时间相近,作者尚未知悉。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楚国方面,不仅国君以谥称,如22章的“声桓王”23章的“声桓王”、“声王”与“悼哲王”,而且封君也有谥称,如23章中的“郎庄平君”、“平夜悼武君”、“阳城桓定君”。作者熟悉近时楚王、封君谥号而对别国之事不甚了了,最可能的原因,便是其本係楚人。

其二,《系年》记事,于楚、晋着墨最多。有关国君世次交替的记述亦然。在楚国方面,通常写作某王“即世”,某王“即位”。如(括号内为章号):

穆王即世,庄王即位(11)

庄王即世,共王即位(15)

康王即世,孺子王即位(18)

①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貳)》,第198-199页。

②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貳)》,第200页。

③ 此处卫君之名和谥号与传世文献记载尚难切合,参看《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貳)》,第195页。

④ 李学勤《从〈系年〉看〈纪年〉》,《光明日报》2012年1月27日,第15版。宋镇豪、胡平生先生也猜测是楚国史官所作,见张春海《清华简〈系年〉或有助填补周代研究空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22日,第2版。

孺子王即世,灵王即位(18)
灵王即世,景平王即位(15)
景平王即世,昭王即位(15、18、19)
昭王即世,献惠王立(19)
声王即世,悼哲王即位(23)

只有18章出现“灵王见祸,景平王即位”,与上列表述有异。但15章另有“灵王即世,景平王即位”则与其他诸例相同。

与此形成比照的是,晋国国君去世多称“卒”。如:

献公卒,乃立奚齐(6)
晋惠公卒,怀公即位(6)
晋文公卒,未葬,襄公亲率师御秦师于崤(8)
晋襄公卒,灵公高幼,……乃立灵公(9)
晋成公卒于扈(12)
景公卒,厉公即位(16)

只有17章说“晋庄平公即世,昭公、顷公皆早世,简公即位。”与楚国常见之例相同。另有16章说“厉公亦见祸以死,亡后。”这与18章称楚“灵王见祸”类似,但多出“以死”二字。

在这同时,《系年》还有关于楚国大夫去世的记载。如15章云“黑要也死”,23章云“景之贾与舒子共止而死”,以及“鲁阳公、平夜悼武君、阳城桓定君,三执珪之君与右尹昭之俟死焉”。对楚大夫称“死”与对楚国君称“即世”形成另一层比照。

在传世文献中,对于死亡的不同用字,往往被赋以特定的含义。如《礼记·曲礼下》说“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礼记·檀弓上》说“君子曰终,小人曰死。”《春秋》隐公二年“夫人子氏薨”。杨伯峻先生归纳说“诸侯之死曰薨,诸侯之夫人或母夫人之死亦曰薨。《春秋》记鲁公或鲁夫人之死,除隐三年‘君氏卒’及哀十二年‘孟子卒’等特殊情况外,皆用‘薨’字;记其他诸侯之死,则用‘卒’字。”^①这里《礼记》两条说的是上下之分,《春秋》体现的是内外之别。

《系年》中,楚国君称“即世”,大夫称“死”,这应该可以理解为等级差异。晋厉公“见祸以死”,也用到“死”字,而楚灵王在一处说“即世”,另一处说“见祸”却回避了“死”字,应该可以理解为内外有别。

“即世”也见于传世文献。《左传》成公十三年记晋侯使吕相绝秦云“无禄,献公即世。……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弔,……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刘文淇疏证云“《越语》‘先人就世,不谷即位’注‘就世,终世也。’此‘即世’犹言‘就世’。僖九年经‘九月甲子,晋侯僖诸卒。’”^②《左传》成公十三年“即世”,《国语·越语》的“就世”,均与新君的“即位”相对而言,正与《系年》相同,应该具有类似的语境。其中前者是在一篇外交文书中,指称本国与对方国君;后者是越王句践在同大臣范蠡的交谈中说到自己的先人。由此看来,“即世”应是对于死亡比较恭敬的表述。吕相所说的“即世”,在鲁国史书《春秋》中都使用“卒”字,^③显示“卒”的恭敬程度当在“即世”之下。

如果这一推测大致无误,《系年》对多位楚王去世称“即世”,而对晋国国君多称“卒”,应是作者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1页。

② 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86页。

③ 晋文公、襄公去世《春秋》称之为“卒”,秦穆公去世,未见于《春秋》,参看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第887、889页。

楚人立场自觉或不自觉的表露。^①

其三,《系年》诸篇通常是讲述某国之事,便采用某国纪年。22章是一个例外。开头说“楚圣(声)桓王即位,元年,晋公止会诸侯于任,宋悼公将会晋公,卒于鼫。”接着详记晋、越联手伐齐之事,完全与楚人无涉。用楚国纪年标记他国之事,体现出作者以楚国为本位的叙事角度。

《系年》与《纪年》之别

《系年》原本无篇名,现在的名字是整理者拟定的。李学勤先生在较早时就介绍说“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史书体裁和已看到的一些文句,都很像《竹书纪年》。”^②《系年》正式发表时,整理者指出“原无篇题,因篇中多有纪年,文字体例与若干内容又近似西晋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故拟题为《系年》。”^③李学勤先生随后还说明“《纪年》、《系年》叙事体例也彼此相似,有些像所谓‘纪事本末’,而不是如《春秋》那样逐年胪列。”^④

对于《系年》的文献性质,学者间有不同看法。资料正式公布之先,夏含夷先生即指出《春秋》、《竹书纪年》属于单国的编年记,《系年》则属于多国综合性的纪年。^⑤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成果发布暨学术座谈会上,笔者提出《系年》与《铎氏微》类似;^⑥胡平生先生认为《系年》可能是一部相关史料的摘抄本,可能是楚国史官从周王室史官或其他有纪年记录的史官记录中将有关楚国或者楚、晋关系的材料整理、编纂而成的。^⑦其后不久,夏含夷先生又指出《系年》之名并不妥当,这个文献更像《国语》的样子。^⑧冯时先生也认为,所谓《系年》,实与编年体史书如《春秋》、《竹书纪年》不同,而采用分章叙事的著述形式。所谓《系年》与《铎氏微》当属同类形式的史书。^⑨

《系年》与《竹书纪年》相比,在起止年代之外,至少有三方面重要区别。

首先,《竹书纪年》与《春秋》类似,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编年体。^⑩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中指出“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晋书·束皙传》也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春秋》的体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指出“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这都准确归纳了《春秋》与《竹书纪年》的编年体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纪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

① 《系年》还记有其他一些诸侯之死。第2章说郑“武公即位,庄公即位。庄公即位,昭公即位”,第4章说卫“戴公卒,齐桓公会诸侯以城楚丘,公子启方焉,是文公。文公即位,成公即位”22章说“宋悼公将会晋公,卒于鼫”22章说吴“阖庐即位,夫差(差)王即位”。这里,就某个国家而言,记载只有一两条。其中或作“即位”,或作“卒”,似可理解为体例未纯(晋国也有这种情况)。

② 李学勤《初识清华简》,《光明日报》2008年12月1日;收入《通向文明之路》,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③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35页。

④ 李学勤《从〈系年〉看〈纪年〉》,《光明日报》2012年1月27日。

⑤ 夏含夷《原史:纪年形式与史书之起源》,“简帛·经典·古史”国际论坛论文,孙少文伉俪人文中国研究所、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2011年11月。

⑥ 参看陈伟《不禁想起〈铎氏微〉——读清华简〈系年〉随想》,武汉大学简帛网(<http://www.bsm.org.cn/>)2011年12月19日。

⑦ 张春海《清华简〈系年〉或有助填补周代研究空白》。

⑧ 这是夏含夷教授在2012年1月27日给笔者电子邮件中所说。

⑨ 冯时《〈郑子家丧〉与〈铎氏微〉》,《考古》2012年第2期。

⑩ 有学者把《春秋》、《竹书纪年》看作“大事记一类编年史”,“属编年体史书的初级形态”;《左传》有完善的叙事,是“更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参看陈秉才、高德《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4页。

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以本非适(嫡),故称携王。”李学勤先生认为《纪年》、《系年》叙事体例也彼此相似,有些像所谓“纪事本末”,而不是如《春秋》那样逐年胪列。今本《纪年》则把古本这一段割裂,分列于幽王五年、八年、十一年和平王二十一年,显然是不对的。^①其实《正义》所引,可能是综合《纪年》多个年份记载的概括性文字,并不表示《纪年》原本如此。《太平御览》卷一四七皇亲部引《纪年》说“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曰伯服,为太子。”这正是上述记载的一部分,适可为证。因而,这类转引的文字,不宜看作否定《纪年》编年体特征的依据。

至于清华简《系年》,大多数的章都包含比较多的时间节点,而不同的章之间,节点又或相交叉、重叠。比如第一章讲武王作千亩、克商,厉王虐,宣王千亩之役;第三章讲武王克殷,杀三监,迁商盖之民,以至秦之始大。又如15、20二章都说到申公屈巫“自晋蹠吴,焉始通吴晋之路”;15、18章都说到灵王“伐吴,为南怀之行”。《纪年》、《春秋》等编年体史籍,以时间为坐标,不致出现重复。《系年》以事件为脉络,这种情形固难以避免。

与此相关的是,《纪年》在记年之外,有时也记月、日。如《水经·涑水注》引云“晋献公二十五年正月,狄人伐晋。”^②《史记·越世家》索隐引云“晋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句践卒。”^③《史记·魏世家》集解引云“梁惠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④记月、记日的情形,《春秋》中更为常见。而在《系年》中,却没有出现一次月份的记载^⑤。23章末尾云“甲戌,晋楚以战。丙子,齐师至岳,遂还。”通篇仅有的这两处记日,因为未连带月份,记时的效果大打折扣。其所以如此,大概也与《系年》并非编年体史书、不重视时间的绝对刻度有关。

其次,《系年》与《纪年》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后者只记事件,而前者在记事件时,往往附带有一些人物话语的记录。如第5章两记蔡哀侯之语,一记赛(息)侯之语;第6章记晋惠公之语;第8章记秦戍人之语;第9章两记大夫之语,一记襄夫人之语;14章两记邠之克(郤克)之语;15章记申公之语。《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艺文志》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似显示早期史载记言、记事有别。而时代较早的编年体史籍,如《纪年》、《春秋》,一事一记,行文简短,并无言论方面的记述。只有到比较复杂的历史著作,如《左传》、《国语》,才带有长篇大论。从这个角度看,《系年》似介于《纪年》、《春秋》与《左传》、《国语》之间,是一种趋向复杂的历史著述。

其三,《纪年》以及《春秋》均有记叙的主体。《纪年》为魏国史书,故以“我”代称魏国。如《水经·丹水注》引云“晋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⑥《沁水注》引云“梁惠成王元年,赵成侯偃、韩懿侯若伐我葵。”^⑦《济水注》引云“梁惠成王五年,公子景贾率师伐郑,韩明战于阳,我师败逋泽北。”^⑧《河水注》引云“梁惠成王十三年,郑厘侯使许息来致地:平丘、户牖、首垣诸邑及郑驰地。我取枳道,与郑鹿。”^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其《纪年篇》……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这也体现出记叙者作为魏人的立场。《春秋》则往往显露出鲁人的立场。如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孔疏云“公,隐公也。及,与也。……史书鲁事,以公为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据鲁为文也。”又“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杜注云“来者,自外之文;归者,不反之辞。”《系年》正好相反,叙事、行文,

① 李学勤《从〈系年〉看〈纪年〉》。

② 参看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③ 参看《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第87页。

④ 参看《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第118页。

⑤ 11章记“庄王率师围宋九月”,13章记庄王“围郑三月”,是讲时间的持续长度,与作为时间定点的记月不同。

⑥ 参看《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第96页。

⑦ 参看《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第114页。

⑧ 参看《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第117页。

⑨ 参看《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第125页。

尽量执持客观、超然的立场,对诸国平行视之。我们在《昭王毁室》、《简大王泊旱》等竹书中比较容易体验到的楚人氣息,^①在这里不复可见。^②在这一点上,《系年》与《纪年》明显有异,而与《左传》、《国语》相似。^③

《铎氏微》的联想

战国时期,史学著述活跃。楚地亦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云“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又《汉书·艺文志·春秋》记云“《铎氏微》,三篇。”班固自注云“楚太傅铎椒也。”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孔疏引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

如前所述,清华简《系年》的写作年代,大约在楚肃王或者楚宣王时。^④铎椒为威王傅,如果是威王即位之后事,与《系年》写作年代相近;如果是在威王尚为嗣君时,则与《系年》写作时间相当。

《系年》以一些大事件为线索,综述始末,不像《春秋》那样属于单纯的编年史,也不像《春秋》那样记事繁多而行文简略。这与《铎氏微》“采取成败”、“抄撮”的特征颇为相符,^⑤也与《左传》的风格相仿佛。

《系年》以春秋一代为主,记西周事是为随后列国叙事铺垫。^⑥而记战国以后事,则与“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相当。依《别录》之说,虞卿受学于铎椒。如然,《系年》与《铎氏微》又多了一层关联。

看司马迁、刘向等汉代学者的记载,在战国中晚期楚地,流行剪裁、改造《左传》以编撰史书的风气。《系年》盖即这种风习中的产物。由于国别相同、年代相近、记述时限相合,我们现在看到的《系年》甚至不排除与《铎氏微》具有某种关联,属于该书纵向授受或者横向流传中的某一版本。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湖北出土未刊布楚简(五种)集成研究”(项目批准号 10&ZD089)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庄乾震)

① 参看陈伟《〈昭王毁室〉等三篇竹书的几个问题》,《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② 上文列举《系年》作者为楚人的几条证据,大概是修饬未尽的结果。

③ 梁启超论述《左传》、《国语》三特色,第一曰“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当时数个主要的文化国,平均叙述。盖自春秋以降,我族已渐为地方的发展,非从各方面综合研究,不能得其全相。当时史官之作,大抵皆偏重王室或偏重于其本国(例如《春秋》以鲁为中心,《竹书纪年》自周东迁后,以晋为中心;三家分晋后,以魏为中心)。左氏反是,能平均注意于全部。其《国语》将周、鲁、晋、郑、楚、吴、越诸国分篇叙述,无所偏畸。”见所撰《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7页。前揭夏含夷先生关于单国的编年记与多国综合性纪年之说,也有类似的意味。

④ 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

⑤ 张舜徽先生分“抄撮”、“铎氏微”为二书,前者是《左传》“删节之本”,后者“释其微旨”。见所撰《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⑥ 李学勤先生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貳)》成果发布暨学术座谈会上的演讲中已有指陈。

Abstrac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 Fight Against Malaria by Shexian Natives Association of Shanghai in 1947 **TANG Li – xing**

Shexian Natives Association was an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mainly controlled by businessman , which had a close link with the local rural society. By means of city autonomous power to solve rural issues , was an effective way at that time. The network presented by Shexian gentlemen was actually a continuation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ir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made Shexian survive through the tough times.

Guangzhou Huachuan in the Middle – term of Qing Dynasty **LENG Dong , ZHANG Chao – jie**

In the Middle – term of Qing Dynas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 society and business prosperity , the prostitution industry also developed. Guangzhou prostitution industry was famous for " Hua-chuan" which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area. It became an important stage of Guangzhou prostitution in Qing Dynasty , and caused an extensive influence on the society.

Study on City Map Pedigree in the early time of Modern Shanghai **ZHONG Chong**

Shanghai modern urban map had led the fashion , but there's no systematic sorting and study up to now. 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ng the map's spread and keep history , this paper analyses its form and the generating background , clarifies that there're mainly four different pedigrees about early modern Shanghai city map. At the same time , it makes preliminary discussion about the related things of the map.

Evolution in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Shanghai Lawyers Association and Its Financial Situation

CHEN Tong

Shanghai Lawyers Association experienced President System , Committee Member System and Supervisors System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evolution was high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holding democratic regime in esteem , and affected the whole domestic lawyers at that time. In the meantime , Shanghai Lawyers Association became more mature at the financial aspects constantly , and had a strict auditing system.

A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Bamboo Book "Xinian" Which Hidden in Tsinghua University **CHEN Wei**

The Bamboo Book " Jinian"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 which hidden in Tsinghua University now , nearly written in Chusu Wang or Chuxuan Wang dynasty , the former was more likely. Inferred from the detailed record , the author should be a Chu people. Its type was different from the annals books " Chun-Qiu" and " ZhuShuJiNian" . It was possibly adapted from " ZuoZhuan" , and related to " DuoShiWei" .

Also Talk "XiangSeFu" and "XiangShou" of Qin Dynasty from "LiYeJian": On the Double Heads Mode in the Basic Management **ZHANG Chao – yang**

Whether there was " XiangSeFu" in Qin dynasty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topic , the " LiYeJian" that